

浴火重生

——1666年伦敦城灾后重建与城市现代化

侯兴隆¹，马伟军²

(1.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2.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1666年伦敦城大火是伦敦史上最严重的火灾，这次火灾也暴露出伦敦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如街道狭窄、环境污染、房屋质量低下且多为木质等。这场大火虽然使伦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使伦敦浴火重生，通过灾后重建，伦敦的街道变得宽阔，房屋整洁且以砖石为主，更重要的是使人们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伦敦自身也由一座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开始转变为一座现代城市，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为伦敦经济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英国；伦敦城；火灾；重建；城市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724 (2019) 06-0088-05

1666年9月2日凌晨，英国首都伦敦布丁巷(Pudding Lane)的一个面包房失火，由于这一年夏天伦敦炎热少雨，而且建筑物以木质结构为主，因此面包房的火星迅速点燃了面包房和它的隔壁——一个小旅馆，在大风的吹拂下，火势迅速蔓延开来，整个伦敦城都陷入了火海。大火整整燃烧了四天四夜，直到9月5日傍晚才熄灭，这场大火对伦敦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伦敦迎来了重生。正如钱乘旦所说：“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大半个城市都给烧光了，大火之后一片焦土。不过这也给伦敦带来更新改造的机会，现代伦敦城的轮廓就是在火后废墟上形成的。”^[1]可以说，1666年的大火是促进伦敦城现代化的助推器，此后伦敦开始迈向现代城市，虽说代价是惨痛的，但意义也是深远的。

目前国内关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有关于伦敦大火的资料散见于詹姆斯·E. 万斯(James E. Vance)的《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2](The Continuing City Urban Morph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A. E. J. 莫里斯(A. E. J. Morris)的《城市形态史——工业革

命以前》^[3](History of Urban For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 F. 雷德威(T. F. Reddaway)的《大火后伦敦的重建》^[4](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等以及当时一些亲历者的日记，如《塞缪尔·佩皮斯日记》^[5](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1660-1669)、《约翰·伊芙琳日记》^[6](The Diary of John Evelyn)、《安东尼·伍德的生平和时代》^[7](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à Wood)等。相关论文有孙竹青、谭刚毅的《大火焚城与涅槃重生——伦敦1666年与汉口1911年的火灾及其重建比较研究》^[8]等。

1666年伦敦大火是伦敦城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火灾亲历者的日记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理清伦敦城在灾后重建的过程，探求此次火灾对伦敦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大火之后的伦敦城

伦敦城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火，有关伦敦最早的火灾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60年，当时一位名叫伯蒂卡(Boudica)的部落女酋长将伦敦烧毁，此后伦敦在982年，1087年，1212年都曾发生过

【收稿日期】 2018-10-26

【作者简介】 侯兴隆，男，甘肃酒泉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史相关研究；马伟军，男，甘肃礼县人，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史。

数次大火。其中，1212年伦敦发生的火灾后果最为严重，有三千人葬身火海。但是，这些火灾都没有1666年这次火灾严重，因此这场火灾有了一个特定的名称“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这场大火世所罕见，以至于在牛津都可以看到伦敦的烟雾，当时居住在牛津的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在日记中写到：“9月2日上午，星期天，伦敦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火灾。第二天，风正向东吹来，烟雾笼罩着牛津。周二，阳光明媚。同样的夜晚，月亮被黑色的烟雾笼罩着，看上去略带红色。”^[7]德莱顿(Dryden)回忆起火灾时那些旁观者的姿态，写到：“内奸的鬼魂从桥上下来，带着大胆的、狂热的幽灵欢呼，他们弯下腰来，用微弱的声音唱着安息日的歌。”^[8]这场大火，将世间百态、人性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大火使得“富人变得卑贱，穷人变得傲慢”^[9]。

这场火灾造成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在许多文献中都有些许记载。其中，贝桑特·沃尔特(Besant Walter)在《伦敦史》中写到：“圣保罗大教堂，这座古老而又庄严的建筑物，有着厚厚的墙壁和高高的屋顶，仿佛只有来自天堂的火才能够烧到它，变成了一片废墟，教堂的中殿和两侧的走廊还伫立着，但唱诗班已经陷落到了地窖之中。有88座教区教堂被烧毁，皇家交易所和格雷西姆交易所都被烧毁了，所有的雕像变成了石灰……伦敦城的六分之五都被此次火灾摧毁了，废墟面积达到了436英亩，有13200座房屋被烧毁，据说有20万人无家可归——以每座房屋平均15位居民计算。”^[10]虽然这场火灾的破坏性非常强，但是很多文献中都记载到只有六个人在此次火灾中丧生，笔者认为丧生于此次火灾中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石质雕像被烧成石灰的温度大约在900-1100摄氏度之间，所以火灾发生时火焰的温度至少是高于这个温度的，而且大火燃烧了四天四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许多死者被持续高温的火焰化为了灰烬。

此外，火灾之后，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谣言比烟雾传播的还快，由于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对内刚刚结束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统治时期，对外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是英国的宿敌，而荷兰由于与英国的存在贸易竞争，且因《航海条例》爆发了英荷战争，所以天主教徒、宗教狂热分子、法国人和荷兰人都被指控引燃了此次大火。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寻找外国人，并发动攻击。一名德黑兰人写到：“由于这里发生了大火，我不敢出去。”^[9]那些胆敢露面的外国人都被群情激奋的市民粗暴地抓了起来，并交给了卫兵。大火熄灭后的第二天，国王查理二

世就骑马到默尔费尔德，向难民们发表演说，安慰他们说，“他们的国王将会特别照顾他们，他宣布阴谋的谣言是假的，这场灾难是上帝派来的。这与法国人、荷兰人或教皇的计谋无关，他亲自检查了许多被拘留的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伦敦公报的第一期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他补充说，将会有一场彻底的调查，由首席法官、枢密院的成员以及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4]

这场突如其来大火将整个伦敦城付之一炬，损失惨重，众多的房屋、教堂、仓库倒塌，商品大都化为灰烬，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就在这种时刻，人们开始讨论起火灾的元凶，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但很快在政府和国王的努力下，人心开始稳定下来，如何快速进行城市的重建成为了伦敦人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二、伦敦城灾后重建的迫切性及争议

灾难过后，伦敦当局迅速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来清理火灾废墟，街道渐渐露出了原来的轮廓，一片片废墟被逐渐清理干净，与此同时，城市的重建工作被迫地提上了日程，“人们担心，如果重建工作被拖延很长时间，市民就可能不会回来了。这种担心是有依据的，并不是烟雾和饥荒所产生的幻觉。在过去三代或更长的时间里，‘伦敦地区’一直是伦敦城的竞争对手”。^[4]伦敦城的商业中心地位正在日益丧失，而威斯敏斯特等周边地区正在逐渐取代伦敦城的地位，攫取其商业利益，因此伦敦城的商人对重建工作异常焦急。A. E. J. 莫里斯也认为：“被破坏的13200处房子中大部分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宅、工场、货舱和店铺。由于已经受到快速发展起来的郊区中心的‘反吸引力’的影响，伦敦城的商业利益必须尽快得到重建。”^[5]在这种功利心态的作用下，伦敦城的重建计划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

此次伦敦城的重建有两个基本目的，即“一是为了提高当地的交通水平，二是尝试把住房修建得比中世纪被大火一扫而光的、破旧的、频繁修理的三角房更耐火、更坚固”^[2]。此外，在1666年9月13日发表了一份皇家宣言，该宣言规定：“任何个人都不应因实施总体利益计划而遭受损失。”^[4]这为此次重建工作指明了工作的方向，以及重建的原则，将房屋修建得更加坚固，使城市更适宜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个人利益不应为此而受到侵害。

1666年10月初，国王任命了六名委员会成员，雷恩(Wren)、休·梅(Hugh May)、罗杰·普拉特(Roger Pratt)、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爱德华·杰曼(Edward Jerman)和皮特·米尔斯(Peter Mills)，他们名义上负责调查工作，实际上

负责重建工作中的所有技术问题。早在9月10日，雷恩就向国王提交了第一份城市重建规划方案，三天以后他的朋友约翰·伊芙琳(John Evelyn)也提交了自己的方案，伊芙琳在一封信中抱怨：“雷恩抢了我的风头。”^[11]之后，罗伯特·胡克也提交了一份重建规划，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重建计划方案，但是只有这三份完整保存了下来。对于雷恩的城市重建规划方案争议颇大，有人认为这份方案是几份方案中最为专业的，但也有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孙竹青、谭刚毅认为：“雷恩是职业建筑师，应该算是最专业的方案。”^[6]丹麦著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拉斯蒂恩·埃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称赞到：“不管怎么说，雷恩在处理交给他的问题上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他的科学知识不仅使他在所有建设性的、经济的和声学方面具有优势，而且通过数学知识的训练，使他在综合能力方面也处于优势，这些使他成为同时期里可靠的规划者。”^[11]而雷金纳德·布卢姆菲尔德(R. Blomfield)对当时的雷恩及其重建规划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认为自己一点也不崇拜雷恩，必须承认在1660年至1670年间，雷恩在建筑方面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业余爱好者，对他的任命更多考虑的是他的影响，而不是出于公正”^[12]。雷恩的方案在当时也充满了争议，相反人们更加青睐于伊芙琳和胡克的重建计划。

最终，伦敦当局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即在保持原有街道布局不变的情况下，扩展街道的宽度，改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砖石提高房屋建筑质量。

三、伦敦城的灾后重建

调查委员会在勘测之后向国王提出了一份关于街道建设宽度问题的请愿书，具体内容为：“位于水边的主干道80英尺宽，泰晤士街40英尺宽；从弗利特街到钟楼那条街是50英尺宽；从霍尔本到阿尔盖特街是55英尺；从圣保罗教堂墓地到齐普赛街为45英尺；从市政厅到齐普赛的有露天广场的街道宽度是60英尺；在那条街的对面，从齐普赛街到泰晤士街的宽度为40英尺；从奥尔德斯盖特街到齐普赛街，以及到泰晤士街的街道宽度为40英尺；从泰晤士街十字到摩尔门街的宽度为40英尺；帕特诺斯特街为40英尺；伦巴第街为40英尺；老贝利街到史密斯费尔德街为35英尺；以及从旧贝利街到黑衣修士街为35英尺；从沃里克街到水坑码头的街道宽度为30英尺。”^[14]这封请愿书把伦敦城街道的建设宽度都计划得清清楚楚，非常详细，而且最终也得到了国王的批准。但是街道的宽度并不是按照请愿书的宽度施工的，而是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削减，但也比火灾

前伦敦的街道宽阔了很多。

此外，这次重建工作中，伦敦当局对重建的房屋类型、大小、材质等方面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大家必须遵守。修建房屋必须遵循规则性、一致性和优美性的原则，“主要街道的住宅高度必须是四层；而普通街道和街巷规定为三层；小巷规定为两层；针对大面积的房屋，没有临街而是在街道后面，带有庭院和花园，它们的高度被限制在四层”^[1]。政府对于房屋建造有了严格的规划，而且建造房屋的材质必须是砖或者石头，使用砖石建造房屋是此次大火留给伦敦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之前由于城市建设的无序发展，乱搭乱建，且大都以木材为主，才使这次火灾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伦敦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定要以严格的标准重建伦敦，使1666年这样的大火不再发生。房屋建设的具体细节重建法案也进行了规定，正如雷德威所说的：“法案规定了所有有利的、可以被管控的方面，无论是地下室围板的位置，还是下水道的建设。木器、横梁、纵梁、板条、椽子等的尺寸都是规定好的。”^[4]政府还任命了一批监察员不时进行检查，如有发现不符合规定的重建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拆除不合格的建筑。

伦敦城的排水、街道清洁、道路坡度、便利设施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重建过程中异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伦敦当局进行了一些行政化改革，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下水问题、街道铺路、街道坡度和街道清洁等至关重要但管理不善的问题，而且他们有权征收税款，如果不缴纳税款，他们有权扣押市民的物品。新建以后的街道变得清洁起来，下水道被埋藏于地下，而且水渠也更利于排水，便利设施也逐渐增多起来，据载：“有一个重要地区，增加了一千两百人的便利设施。”^[14]

为了使这场大火为后世所铭记，伦敦城建立了两座火灾纪念碑，一座位于火灾发生地布丁巷，一座位于火灾熄灭地史密斯菲尔市(Smithfield)，这两座纪念碑分别由雷恩和胡克设计，纪念碑上铭刻着火灾发生时的情景，以及国王查理二世在火灾中的救灾行为。两座纪念碑象征着伦敦城的浴火重生，同时也在提醒着人们，勿忘这座城市曾经所经历的大火，正如W. G. 贝尔所说的：“火灾纪念碑上的铭文，骄傲地注视着周围的交通潮流，这并不是向世人展示雷恩无与伦比的天才设计，而是在火灾发生的地方提醒伦敦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这次火灾是这座城市千年之中经历过的最大的灾难。”^[9]

这次大火使伦敦城化为一片废墟，造成了巨

大的财产损失,但伦敦人很快就投入到了积极的重建工作之中,虽然在重建的过程中政府、个人等都遇到了各种困难、阻力,但这些都无法阻止一座现代城市的产生,1672年伦敦重建大体完成,整个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无不为之兴奋,当时的一位伦敦市民自豪地说:“这不仅是最好的,还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13]

结语

1666年伦敦城大火是这座城市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重要一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伦敦通过灾后重建实现了浴火重生,一座近代城市拔地而起,为伦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保证。

“城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必然引起城市外观形态的变化乃至变革,也必须要有这种变化与变革来与前者相适应。”^[14]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国家纷纷借助海外贸易的东风快速发展,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迅速崛起,英国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而伦敦又位于英国的东南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道纵横,伦敦港是天然的良港,国内外交通十分便利,因此伦敦在16、17世纪迅速扩大,城市发展几乎无序,街道狭窄、污水横流、房屋大都以木质为主,且非常简易,人均居住面积狭小。毫无疑问,1666年9月2日开始的这场大火,是伦敦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13200座房屋被烧毁,88座教堂倒塌,经济损失达1000万英镑,但只有经过阵痛,才能迎来新生,只有浴火,才能重生,重建之后的伦敦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整洁、宽阔,正如W. G. 贝尔所说:“这场大火的伟大之处在于烧毁了腐朽的、反复着火的、可怕的、有害于生命健康的房屋,并在火焰中净化了公民被迫生活的不健康的环境。”^[9]此外,伦敦有“超过9000座标准的砖石结构房屋被修建起来”^[15]。基于这次大火的惨痛教训,人们认识到了砖石房屋的优势,因此砖石取代了木材成为英国建筑房屋的主要材料,“北安普顿曾在1675年为大火所毁,结果用砖石再建得更好,街道宽阔宽敞”^[14]。

1665年伦敦大鼠疫是它最后一次在英国本土广泛蔓延,每周有7000人死于这场瘟疫,1666年的火灾把疫病的源头及有利于其广泛扩散的恶劣居住环境等付之一炬,此后,伦敦城再也没有发生过鼠疫,这不得不说是这场火灾带来的意外之喜,不仅民众的生命安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而且城市的健康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得伦敦更适宜人们生活。这座重建后的城市,防火是人们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因此作为此次火灾

的产物之一——火灾保险公司,在尼古拉斯·贝尔伯恩(Nicholas Belburn)的努力下建立了起来。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是伦敦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中的重要事件,通过这次大火,伦敦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而且由于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反过来刺激了伦敦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钱乘旦,许洁明. 英国通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91.
- [2] 詹姆斯·E. 万斯. 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M]. 凌霓,潘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29.
- [3] A. E. J. 莫里斯. 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 成一农,王雪梅,王耀,田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31-632,644-645.
- [4] T. F. Reddaway.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M].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40:29,42,62,60-61,285,287.
- [5] Isabel Ely, ed.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1660-1669 M. Eau Claire: E. M, Hale and company, 1970.
- [6] John Evelyn.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M].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50.
- [7] Anthony Wood,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à Wood[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158.
- [8] 孙竹青,谭刚毅. 大火焚城与涅槃重生——伦敦1666年与汉口1911年的火灾及其重建比较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5(5):11.
- [9] Walter. G. Bell,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1666, M London: Bodley Head, 1923: 27,79,74,265,15.
- [10] Besant Walter. The History of London[M]. Luton: Andrews UK Limited, 2010: 195.
- [11] Steen Eiler Rasmussen. London: The Unique City M.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102,104.
- [12] Pevsner.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 [M]. A. E. J. 莫里斯. 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 成一农,王雪梅,王耀,田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37.
- [13] Michael Cooper. A More Beautiful City——Robert Hooke and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 [J]. 孙竹青,谭刚毅. 大火焚城与涅槃重生——伦敦1666年与汉口1911年的火灾及其重建比较研究.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5(5):11.
- [14] 刘景华. 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 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112-113.

- [15] E. L. Jones, M. E. Falkus, Urban Improvement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J.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1979 (4): 122.

Rise from the Ashes—
Re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after the Disaster in 1666

HOU Xinglong¹, MA Weijun²

- (1. College of History Lan Zhou University, Lan Zhou Gan su 730000;
2. TianFu College of SWUFE, Mian Yang Si Chuan 621000)

Abstract: The City of London fire in 1666 was the worst in the history of London. It also exposed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London's urban development, such as narrow stree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oor quality of houses and mostly wood. The fire cost London dearly, but it also gave it a new lease of life. By rebuilding, London's streets were wide open, its houses clean and brick-base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mak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more comfortable. London itself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typical medieval city into a modern city.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has greatly improved, which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economy to a higher level.

Keywords: Engl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re; Reconstruction; Urban modernization